

民國史的見證者

陳芳明

——訪問吳相湘教授

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國內的學術界出版了一冊引人注目的史籍——「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這本書出現在中日外交關係遽然斷絕之後，確實具有不平凡的意義。今年四月，日本片面毀壞中日航空協定的時候，這本書的下冊也正式問世。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1945）是中國現代史上最不愉快的一段記憶，而紀錄這段不愉快史實的書籍，也正好在中日關係最不愉快的時候出版，這不能說是一種歷史的巧合，無疑的，這個巧合更加深了這部「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時代意義。

這部長達一百二十餘萬言的巨著，是由當代的史

學家吳相湘教授編著而成的。以一個人的精力，來整理這段龐大的民族戰爭的史實，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竟能憑藉一股不滅的意義，費三十年的光陰來搜集資料，並以整整兩年的時間潛心撰寫，終於完成了這部皇皇巨著。吳相湘先生是今日中國史學界，提倡研究民國史的風氣最力的一位學者，他不僅呼籲國人應該關心民國的歷史，以保存史實的眞面目，同時，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以畢生的精力專注於民國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而且也秉持中國史家的優良傳統，紀錄他對當代史實的所見所聞，他的史書和文集就流露一股據事直書的精神，論見識，論勇氣，在在都



吳相湘教授

使人欽服不已。

今年，吳先生正好滿花甲之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三時，筆者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首先看見的是他雙鬢已有些微星霜，然而他的眼睛炯然有神，身體相當硬朗，看不出他的年齡已有六十歲了。在沒有拜訪他之前，曾聽許多朋友說，他說話非常嚴厲，使人敬畏；沒想到和他談話之後，竟是那樣親切，不會令人感到隔閡。那天，筆者就當前現代史的研究概況，以及他個人的治學過程，一一向他請教，他都以冷靜而和緩的語氣回答，以下便是當天談話的部份筆錄，和筆者對吳相湘先生的一些認識。

一 早年的讀書生活

吳相湘先生，湖南常德人，民國三年生。湖南是中國現代政治人物的淵藪，它的歷史地位和廣東差不多，例如：在廣東出生的人物有康有為、容闈、孫中山、梁啟超……，湖南人有曾國藩、左宗棠、黃興、蔡鍔……等等，他們都是自晚清以來，影響中國近代史演變的重要人物。吳先生幼年的生活環境，或多或少受到這些人物的薰陶，對於他們的事蹟從小也就耳熟能詳。他小時候遊歷的地方，包括曾文正祠、左文襄祠、黃興、蔡鍔墓，這些地方對他的個性和興趣多少已有啓發的作用，他日後之所以會接近歷史，特別是對近代史方面的研究，可以說奠基於童年時代。

他進入中學以後，曾經辦過報紙，報導學校的體育新聞。新聞紀錄和歷史紀錄原是很相近的，無形中使他受了一些史學方法的訓練。他微笑着說：「最初，我的父親是希望我能够學醫，以懸壺濟世，後來我的身體不好，同時他又發現我的興趣不在學醫，却喜歡閱讀史書，所以就帶我去謁見李劍農先生。」這是

他一生研究歷史的關鍵。

李劍農先生是武漢大學的教授，當時年近五十左右，他的現代史名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已經出版。那次的談話，得了不少的啓示。他回憶着說：「李先生以他自身的治學經驗告訴我，他在民國初年辦過報紙，也編過雜誌，在湖南也擔任過教育司長。辦報、教書、從政等等的經驗，對於歷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譬如在報館擔任主筆，對現代史的修養有若干的影響。他的那本『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是以白話文寫成的，具有相當高的可讀性。如今想起來，我應該感謝李劍農先生的指導，今天我之所以一方面寫歷史論文，一方面撰寫時論，不能不歸功於李先生的指教。」他認為這是自己的經驗談，今日青年人往往過份地趕時髦，而很少向年老的一輩請教，吸取經驗，這是非常可惜的。

他在高中畢業後，便參加北京大學的入學考試，他是在武漢報考的（當時分成北平、武漢、上海三個考區）。當年有三百餘人報名，錄取名額二十人，文學院只取六人，吳相湘先生很順利地考取了，到學校後，他才知道自己的國文成績居然考了九十多分，那

是民國二十二年的事。民國二十二年正是中日簽定「塘沽協定」的一年，當時北方學人都主張忍辱負重，努力爭取時間以建立民族的自信心。從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抗戰爆發，共有四年的時間，吳相湘先生就在這難得的四年裏，完成了大學教育。艱難的時局，往往使一位青年學生的心智成熟得特別快，再加上名師的薰陶，使他早熟的心靈更加關懷國事。

北京大學在蔣夢麟先生的領導之下，以「新北大」自我期許，使得當時的學術界非常富有朝氣。當時的北大史學系，可以說名師薈集。教中國上古史的是傅孟真先生，教文學史的是胡適先生，教佛教史的是湯用彤先生，教中國通史的是錢穆先生，教目錄學的是趙萬里先生，明清史是孟森先生，近代史是蔣廷黻先生，歐洲史是陳受頤、姚從吾先生；如此陣容堅強的史學系，全國各大學尚無出其右者，而且也是空前絕後的。他正好恭逢其盛，可以說是非常幸運的。他說，胡適先生曾在一個茶會上說：「與其說是文學院，不如說是史學院。」胡先生的意思，一方面是指無論研究文史哲，都必須參照中國歷史的文物制度，以推陳出新；一方面也說明了史學系在北大文學院所居



的地位。

在這些老師中，他獲益最多是傅孟真先生，傅先生教中國古代史研究與古代文學史，他督促學生非常嚴謹，要學生背誦詩經。傅先生的嚴格教學法，並非要使學生敬畏，而是藉他的獨到之見與治學成就使學生用功讀書，多受啟發；他採取的是歐洲教學方法，

不限制學生的讀書範圍，讓學生依照自己的興趣去發展。他教起書來，如長江黃河，波瀾壯闊，所以同事都稱他如「野馬」，意指和胡適的美國教學法不同，胡先生上課條條有理，傅先生則多向發展，但仍能理出一條秩序來。吳先生說：「雖然時間已過去四十年了，可是上課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傅先生穿着山東

繭綢的褐色西裝，彷彿如昨。」「這多少年來，我在國內教書，都一直效仿他的教學方法。我去年（六十二年）八、九月赴美，參觀了幾個大學，看到他們開二十世紀中國史，或中國近代史等課，都是一個學期的課程，教授有詳細的講授綱要，規定參考書七、八種之多，合計約兩千頁以上，規定學生看完並作報告。我強調這點的理由，是因為現在國內大學生只會上課作筆記，很少讀書；美國學生雖然有風潮，但現在平靜下來，便認真讀書，相形之下，今日國內的大學生實在太輕鬆寫意了。」他又進一步強調：「最近臺大的『大學新聞』

有兩篇文章提到我，認為我的作風和傅孟真先生的直線條個性很相似，我感到很安慰。因為，我在十二年前就講過，求學必須學習傅先生嚴格的『動手動腳找資料』的精神；同時在待人處事方面，要學習傅先生的『反鄉愿』的精神。如今青年學生對我有這樣的看法，也就無負於師門了。」

北大的讀書風氣很盛，不過，讀書環境和現在臺灣比起來，顯然是有些不同。當時他們能利用的圖書館，除北大本身和附近幾個大學之外，校外則只有故宮圖書館和國立北平圖書館。吳先生認為在臺灣做學問比較方便，因為從前在北平圖書館的許多善本書，都已在臺灣影印出版，而故宮檔案，以及外交部，黨史會的檔案也都陸續問世，可以利用的圖書館如：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省立臺北圖書館等等合起來，比起北平有過之而無不及。並且，現在國內和海外文化交流，可以利用歐美、日本各國的資料，進一步利用微捲和影印的方式，使治學更為方便。不過，他覺得自己做學問之所以不敢輕忽大意，主要是從前在北平建立了基礎，知道學問浩如煙海，瞭解學問嚴肅的一面。

二 晚清宮庭的研究

吳相湘先生在近代史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受了孟森和蔣廷黻兩位老師的啓發。孟森先生是民國以來，研究明清史的權威，在民國初年曾撰寫「董小宛考」，考證非常精詳，改變世俗傳說的錯誤；後又在北大撰成「清初三大疑案考實」，這兩篇文章引起吳先生研究宮闈秘辛的興趣，因此決定大學畢業論文以「咸豐辛酉政變」為題，請孟森先生為指導教授。這篇論文運用了當時的日記檔案，包括宮中檔案、軍機處檔案及內務府檔案。他說：「雖然晚清宮庭的事蹟，當時人如薛福成、王闓運都有紀錄，不過都受制於慈禧的淫威，不敢秉筆直書。幸而我在故宮裏找到了一些檔案，而且民國以來，也先後公開了當時的密件，我才能够加以綜合起來。」

他談到為什麼要用「辛酉政變」這個名詞的原因，最初中國沒有「政變」這個名詞，而是由英國直譯過來，謂之「苦迭打」（政變，*coup d'état*），後來有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一書，創「戊戌政變」一

詞，所以他也創出「辛酉政變」和「戊戌政變」相提並論。他說：「我確認要創用辛酉政變這個名詞，是因為慈禧正式在這一年奪權的開始，有了這個政變，她才能自私自專權，也導致後來的戊戌政變。」辛酉政變指的是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後，咸豐皇帝携慈安、慈禧二妃逃往熱河行宮，同行的尚有肅順、端華、載垣等大臣，咸豐帝在熱河崩駕之後，造成二后和肅順等顧命大臣兩股勢力，而展開了宮庭政爭，在辛酉年（一八六一）慈禧終於破壞了清廷的祖宗家法，奪得政權，以太后身份垂簾聽政，嚴重地影響了晚清政局的演變。這篇論文大量引用第一手史料，是一般研究晚清歷史者，第一位注意到這段史實的學者。他的畢業論文獲得孟森、胡適、傅孟真、姚從吾四位先生的賞識，以高分畢業。

後來，他又補充修改這篇論文，成了他所撰的「晚清宮庭實紀」一書中的第一篇——「咸豐辛酉政變紀要」，他在書中自序特別強調：「自來言中國近代史或慈禧事者，每多強調光緒戊戌政變之重要性，而不能詳述咸豐辛酉政變本末，甚至世人於『辛酉政變』一辭亦多不了了，然一究其極，則辛酉之事，實為

中國近代史一大關鍵！質言之：若無辛酉之變，則根本將無戊戌之事也。」他在「三生有幸」那本自傳也再次提到：「我創用『咸豐辛酉政變』這一名詞，不僅與梁啟超撰述『戊戌政變』相提並論，歷史意義尤遠超過之。因為如果沒有辛酉政變，根本就不會有戊戌政變了。更重要的是我運用了宮中密檔文件，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却祇是他個人的見聞。」由此可以知道這篇論文的價值。

民國三十一年，他在長沙將這篇論文印行，後來成為中國此代史學者所必須參閱的。當年，他之所以會接近歷史，是受到李劍農先生的啓發，而李先生改寫他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時，就採用了他的「辛酉政變」的論文，這樣的相互影響可以說很有趣。此外，蕭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也引用了他的這份資料。民國三十二年，他獲得了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的獎助金，同時，也得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圖書月刊」的好評，這些事實等於確認了他研究的成果，現在美、日等國的學者運用此書的地方甚多。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吳先生自北京大學畢業，即赴中央研究院工作，未料蘆溝橋事變爆發，中國展開

全面的抗戰。中央研究院從南京遷往湖南長沙，而北大、清華、南開三個大學，也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姚從吾、馮友蘭諸教授發起組織「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使他體認了這一工作的重要性。到了民國三十年，軍方徵聘各項專門人員，其中有史料編纂一類，他決定參加聖戰行列，乃在同年十月，穿上了戎裝，赴第九戰區工作，直接和敵人接觸，親身經歷了戰火的滋味，這是他日後撰寫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張本。

抗戰勝利後，他又到北平故宮博物院擔任編纂，看到許多新發現的史料，當時的故宮文獻已整理得比較有條理，將有關記載皇帝衣食住行的檔案，分別製有卡片，對皇帝的嗜好憎惡紀錄得非常詳細。吳先生對這些資料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認為有加以綜合研究的必要。他當時希望能寫成一部「清代皇帝之衣食住行」，以作為北平故宮博物院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出版品之一，他覺得一般人對歷代皇帝的日常生活，往往以訛傳訛，如果能夠把這些史料纂輯成篇，不僅可以糾正過去的訛傳，而且更適合大眾的興趣。可是，當他積極研究整理這些資料時，東北華北的局勢已日益危急，那是民國三十七年的冬天。

民國三十八年年初，他從上海轉到臺灣來，隨身也攜帶了在故宮文獻館所抄錄的史料。他的「晚清宮庭實紀」一書，便是運用這些史料，將「咸豐辛酉政變」加以擴充而成，民國四十一年由正中書局出版，書中所附的「慈禧親筆硃諭」的照片，是慈禧太后手寫的文字首次公開印行，非常珍貴。民國四十二年，遠東圖書公司又出版他所撰的「清宮秘譚」（即「紫禁城秘譚」），都是根據故宮檔案寫成的。這兩本書的出版，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重視，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便是因「晚清宮庭實紀」一書和他建立了學術合作的關係。而「清代皇帝之衣食住行」撰寫的計劃，則因離開北平，不能再接觸第一手的史料，已不可能繼續研究，對於這點他頗為感嘆。

晚清宮庭的研究雖然沒有繼續下去，不過，他對這方面的資料和書籍，仍舊有興趣收集，特別是有關慈禧史實的書刊，他仍隨時加以注意。從民國四十三年以後，他的研究重點便轉移到現代史方面了。

三 民國史的研究

民國四十三年，吳相湘先生寫成「俄帝侵略中國史」一書，由正中書局出版。這本書是敘述近三百年來俄羅斯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史實，分爲上下兩篇，上篇起自一六五二年中俄在黑龍江濱開始衝突，以迄一九一七年沙皇政府崩潰爲止；下篇專述俄執政後，變本加厲，假藉世界革命的口號，實行赤化及侵略中國種種陰謀與事實。

吳先生認爲，我們對俄、日這兩個鄰國的研究實在太不夠了，中國近代史迭遭變局，都是受到中俄、中日的外交關係的影響。這一點吳相湘先生承認，他是受到蔣廷黻先生的啓示，他說：「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大綱』雖然很簡略，然而對於中俄和中日的外交關係，已指出它的重要性，蔣先生曾再三呼籲國人注意這方面的歷史。我在北平時，就向蔣先生請教過中俄伊犁交涉的問題。」他研究民國的歷史，也特別注意中俄和中日關係的演變，早在民國三十五年，抗戰勝利後，他看到蘇俄的軍隊仍駐在我國的東北，便爲湖南長沙中興日報寫成了一篇社論，以「東北蘇軍爲什麼不撤退？」爲題（此文收入吳著「愛國憂

時文存」），揭發蘇俄覬覦我國的陰謀，他以一九〇〇年俄國藉八國聯軍之役，乘機侵佔我國東北的事實爲前例，強調蘇俄有意強佔中國的領土，他呼籲國人應該警覺，這篇文章發表後不過三年，大陸局勢突變，充分證明了他這篇文章認識時局之正確。

談到「俄帝侵略中國史」這本書時，吳相湘先生很謙虛的說：「這本書是二十年前出版的，從今天看來，對中俄兩國關係的輪廓，只是大約描繪出來，建立了一個初步的架構而已。這二十年來，有關中俄關係的新史料，層出不窮，我這本書裏面有若干地方需要補充修正，但是，我目前實在沒有時間再來做增訂的工作，因爲其中的每一節都可寫成一篇博士論文，我很希望年輕的朋友多向這方面發展。」吳相湘先生的這段話，可謂語重心長。中國近代的歷史，屢經日俄兩國的欺侮，可是真正研究這兩國歷史的書籍，能够引起國內外學者重視的，又有幾冊？

吳相湘先生在民國史方面的研究，當以民國初年的歷史用力最深，他的兩本著作：「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宋教仁」和「中華民國國父——孫逸仙先

生」，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民國四十七年，他和美國華盛頓大學合作，進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計劃，他的「宋教仁先生傳記」便列為其中的專題研究之一。他得到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同意，獲閱黨史史料庫的資料，這項研究經過兩年的時間，其間還前往美國、日本各大圖書館訪尋史料，「宋教仁」一書便是他積極搜集資料，謹慎研究考證的成果。這本書不僅注重史實的考證，而且對於歷史解釋也是非常重視，對於宋教仁一生的事蹟頗能闡發旁人所未見的資料，特別是對宋教仁的政治見解，更加予以敘述發揚，譬如他在書中，強調宋教仁努力推進民主政治，且早在四五十年前，便力言中國絕不能引用共產主義，他認為這是宋教仁的精神之可敬處。「宋教仁」一書，於民國五十三年由文星書店出版，現由傳記文學社印行。

「孫逸仙先生」如同「宋教仁」一書，也是他民國史研究的一本重要著作，這是他多年以來的虔誠心願，這本書原計劃在民國五十四年國父百年誕辰的時候，全部完成的。為了寫成這部書，他也特地到海外的圖書館去查訪史料，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倫敦檔

案局看到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八年有關中國革命的資料，而關於孫中山先生在倫敦蒙難的文卷，吳先生是中國人中第一位獲得閱讀機會的；另外，在東京外務省看到支那革命黨及留學生的檔案，很幸運地獲閱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〇年有關孫中山先生活動的文卷三冊，在此之前，此三冊文卷未被發現；在新加坡的國立圖書館，也見到海峽殖民地政府的檔案；並看見國內所沒有的史料，如：新加坡大學圖書館收藏的革命黨與保皇黨筆戰的中興日報、總滙報、圖南日報等等。他這樣辛苦的奔波海外各地，主要是追蹤國父當年的革命活動，那種鏗而不捨的精神，直可以和司馬遷撰寫「史記」的審慎態度媲美。

這部孫中山先生的傳記，原擬寫成四冊，即：第一冊包括國父出生至三十五歲的事蹟。第二冊敘述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一年國父從事各種革命活動的情形。第三冊是紀錄民國建立至民國七年，國父為維護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所作的種種努力。第四冊是分析解釋國父對五四前後（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國內外新思潮新發展的種種言行。他所運用的資料都是最新發現的文獻，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忠實地刻劃國父

的眞面目，並糾正一般描述錯誤的書籍，以完整地顯露國父一生的行誼和精神。目前，這部傳記只出版第一冊，他說：「現在英美新公開的資料很多，如果有足夠的財源繼續支持，我一定能完成這項工作。」

無疑的，從第一冊「孫逸仙先生」的傳記來看，就可瞭解他治學態度之仔細，對於國父早年的求學和革命活動的情形，以編年紀事的方法，敘述得很詳確，堪爲國父傳記的權威之作，這是他主張「國父生平研究學術化」的一個範例。

十餘年來，吳相湘先生便一再呼籲要研究中華民國的歷史，一般人對民國以來的事蹟往往不甚瞭然，甚至曲解了史實，有的人還提出「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口實，以迴避民國史的研究，對這些現象吳先生表示非常痛心。他曾寫過一篇文章——「趕快搶救中華民國歷史」，說明今日學者疏忽民國史的嚴重情形，他在文中強調，如果要保存中華文化，就必須爲中華民國的歷史留下眞相，要建立國人的民族信心，更應該保存現代史的眞相；可是，當前的學術界又有多少人重視這項工作的眞義呢？民國五十年的時候，他在中央日報就以「爲什麼要迴避民國史的研究」爲

題，提醒國人的注意，並指出一般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往往只限於十九世紀的中國，而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就沒有勇氣去研究，相反的，美、日兩國對中國現代史反而積極計劃研究，讓外國人輕易地獲得「發言權」，則現代的許多中國問題，只有任意由外國人去解答了。他在文後並提到胡適先生的話：「我們到今天還沒有一部中國史家著作的『中日八年戰史』，也沒有一部中國史家著作的抗戰前的『六年中日關係史』，這都是很可耻的事！」

吳相湘先生的文章，表示了他內心的沉痛，當他責備史家迴避研究民國史時，他自己則默默的工作，獨自負起撰述中國現代史的責任。民國四十九年他開始編輯「中國現代史叢刊」，鼓勵國內學者研究現代史的風氣，他這項工作開始進行之後，果然立刻引起國際學者的重視，尤其是日本的學術界，更參引這套叢刊所發表的論文。民國五十一年，他更進一步影印「中國現代史料叢書」，凡是民初以來的重要文獻，都一一加以影印刊行，他在「中國現代史料叢書敘言」中，便明白揭示出版這套史料的宗旨，一方面是提供海內外同胞閱讀民國史事的興趣，並能認識和了解

「現在」形成的由來；一方面是要國人體認失敗是成功之母，和多難興邦的道理，加強獨立自尊建國的信心。他在文章裏說：「我們對於近五十年來若干禍國誤國以致內亂外患愈演愈烈實在深痛惡絕；但在同時我們無論自遠大處或從精微處觀察：發現全國軍民慷慨犧牲的奮鬥，沒有浪費這多災多難的五十年寶貴時光，尤不勝其欽佩景仰。換句話說：這五十年來我們已有很多重大的成就了：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對日抗戰勝利是大家熟知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民族意識愛國情操已因憂患備嘗而更熾熱了，同時對於國際文化交流也形成了正確的觀念。」這樣鼓舞的話語，可以說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主要目標，面對如此光榮的事實，身為一位史家如何能夠迴避呢？

除了上述的書籍和編纂之外，他所著的現代史書包括：「民國政治人物」、「近代史事論叢」、「近代史料舉隅」、「中國現代人物」、「近代人和事」、「民國人和事」，而最重要的兩本著作便是：「民國百人傳」和「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四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撰寫

民國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吳相湘先生應邀參加了美國哥倫比亞的「中國現代政治與人物」的研究計劃，使他有機會到海外去閱讀國內難得一見的史料，同時也認識了外國人研究中國現代史的情形。四十九年他從日本回來，就有許多感觸，他發現日本軍方所編的「支那作戰紀錄」，推卸了中日戰爭的責任，日本這種有計劃的工作，無非是要曲解史實，並蒙蔽世人的子孫後代。所以，他回國後，便呼籲國人注意這個事實，希望有心人趕快編纂一部翔實的抗戰史，以免日本人故意曲解。同年十月五日聯合報，便響應了吳先生的呼籲，並以「趕速編纂中日戰史」的社論，要政府和學者共同完成這部著作。公論報也以「我們豈祇需要一部對日抗戰史」的社論，披露了吳相湘先生的憂心。然而，從四十九年到六十年，十餘年的時間過去了，始終沒有人出來擔當這項重任，所以，吳先生毅然執起史筆，開始撰寫「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他很感慨地說：「當初，我以為政府既有黨史會，國史館等機構，必有足夠的人力和財力撰寫一部抗戰史，如果這些機構出版的話，就不必由我個人來動筆。我個人雖然抄錄許多卡片、資料，並且也擬好了綱

要，但一直沒有正式動筆。到了民國六十年，綜合月刊社張任飛先生要求寫一部中日戰爭史，我鑒於國際局勢的動盪，國家處境非常險惡，使我有『時不我予』之感，才決心動筆！」

事實上，吳先生是撰寫抗戰史的最佳人選，因為，他受過最好的史學訓練，看過許多最新的資料，又親身參加了抗戰的行列，這些條件並不是每位史家都能够具備的。從塘沽協定開始，他就不斷地注意當時的資料，民國二十六年秋，姚從吾先生組設的「中日戰爭史料徵輯會」，使他更加重視這次民族聖戰的演變；民國三十年，他正式投筆從戎，加入第九戰區（以湖南為重心）的行列，這是抗日戰爭的第一線，長沙、衡陽、常德會戰，他都一一經歷。每逢一次會戰結束，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各部隊戰鬥的詳報，都先後集中到參謀處，他和編譯股的同仁便開始研讀編纂，參與作戰的人員也隨時答覆他們的問題；同時，他們也收聽日本方面的廣播，並一一將之紀錄下來。這些直接的史料，便是他日後編纂戰史的主要資料。他也親眼觀察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實況，使他體驗了戰爭的殘酷，以及中國不屈不撓的精神。他並且在敵後也

辦過「民治報」，每晚利用美軍報話兩用機收聽紀錄各地的廣播，翌早加以編輯標題，立即付排，每天中午出版，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德國無條件投降，「民治報」還印了十萬份的號外，隨着軍隊的挺進散發。這些經驗，都是最寶貴最原始的資料，抗戰勝利後，就根據這些可靠而難得的第一手史料，編纂成「抗戰紀實」一書，民國三十六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現在臺灣商務印書館有再版本）。

他說：「三十年來，我一直留心收集這方面的史料，把所能看到的史料書刊，凡能力所及，都和自己在那時候的親身經驗加以印證，所以我有想把中日戰爭的輪廓描繪出來。民國四十八年，我第一次到英、美二國，就動手搜集資料，四十九年又到日本，並去韓國三個月，五十一年到越南、泰國、新加坡，五十六年又再度到日本、美國，前後共十幾年的時間，都在尋訪資料，一方面閱讀書刊，一方面看看日本侵略戰爭的遺跡。」他又微笑着說：「我寫這本書時，非常專心，每天大約寫三千字，這段時間可以說：『六親不認』，連我太太和女兒的生日都忘記了。」顯然，他撰寫這部戰爭史，已是全力以赴了。

這部書共計十二篇，是以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的方法貫穿而成，他的目的是要把「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的全面戰爭的各種情況，忠實地記載下來。這部書的出版，真正代表了一個中國人對中日戰爭的看法，抗戰勝利至今已屆三十年，終於有一部成熟而翔實的史書出版，這是每位中國人感到欣慰的。

一般的戰爭史，往往只注意到戰爭的成敗，戰略的調度，讀起來只是軍事史而已，而這部戰爭史則顧及到軍事、政治、經濟、學術、社會等各個層面。例如，在學術方面，「第二篇日軍正式攻城奪地」，便特別敘述北方學人贊成忍辱負重的主張；「第四篇中國準備抗敵救國」，也提到了北方學人的憂時言論。在社會方面，第四篇也特別強調新生活運動的重要性，以及此運動對民心士氣的鼓舞。在經濟方面，他也注意到中國政府對財政金融制度強化，並盛讚抗戰期間實行田賦改徵實物這項措施的成功。正因為他顧及到戰爭與文化各個層面的交互關係，所以這本書讀起來相當龐雜，也相當周密，這恐怕不是一般史家所能望其項背的。吳先生說：「這本書是第一部以個人之力撰成的，雖然粗枝大葉，但主要是表現全面戰爭的

真相。因為，現代戰爭並不是靠軍隊而已，而是不分前後陸空，同時也是物質、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戰爭。」以這句話來印證這部書的內容，可以看出他在這方面的努力，而且也寫得很成功。

他說：「這本書是一部通史，旨在適應一般人來閱讀，所以我不用專題考據來寫；但此書也不是通俗的讀物，我運用了學術的成果，以平易的方式來表達；換句話說，既可以讓平民來看，也能够讓學術界參考。」

「民國百人傳」和「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是互為表裏的兩部書，因為這樣龐大的歷史事件，必須以人物傳記、編年、紀事本末三種體裁綜合敘述，才能够比較詳盡地說明這一聖戰的具體真相，他說：「這兩本書是相輔相成的，在戰爭中，有『無名英雄』，也有『有名英雄』，我的原則是：詳他書之所略，略他書之所詳。所以，『民國百人傳』談到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就省略了，以便敘述其他的事實。例如：俄國和中共在抗戰時的活動，因為我已出版『俄帝侵略中國史』，在書中已有詳細的敘述，所以此書便省略一二，讀者可以相互參閱，然後得到史實的全

貌。」由此可知，「民國百人傳」是納入「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寫作計劃之中，但爲之立傳的人物，並不僅僅限於抗戰這一段時期，他認爲，近六十年來，有三個最大的事件值得一書，即：革命、抗日、反共抗俄，這也代表了民國史演進的三個階段，凡在這三個階段中，曾經發生過影響力，或是比較重要的人物，他都有心爲他們立傳。

他說：「『民國百人傳』並不是剛好一百人，而是取『百姓兆民』的意思，六十年來，對民國有真正貢獻的，豈只是一百個人而已？這部傳記只能算是『抽樣』而已，我還要繼續撰寫下去。」稍爲留心的讀者必會發現到，這部書所收的傳記，和他過去所著的「民國政治人物」、「中國現代人物」有重複之處，這點便證明他寫「民國百人傳」從很早就計劃着手了，上述兩本書只是這個計劃的部份而已。他寫百人傳的主要目的，便在於「增強信心，培植人才」，他認爲在這六十年中，我們的初步目標是：「推翻君主專制」、「打倒軍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廢除不平等條約」，都在全國同胞的共同努力之下，一一實現；但爲什麼頃刻之間神州陸沈的慘劇發生了

呢？在書中的自序裏，他說：「一言以蔽之：世界進步太快，我們的人才太少，知識落後，尤其沒有切實地做到『知己知彼』工夫，是最主要因素。」這段話可謂一針見血，指出教育的失敗是主要根源，抗戰爆發時，全國文盲佔國民的百分之八十，以致贏得勝利之際，也正是失去和平的時候。這樣的見解，充分顯示出這位史家認識之正確，要恢復我們的信心，唯有從教育着手，而歷史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民國百人傳」便是提供前人的心血經驗，一方面以事實說明國家盛衰繫於人才的重要性，一方面提供現代青年一些自強救國的實際經驗。吳相湘的這項撰寫工作，實在是用心良苦。

「民國百人傳」目前已出版了四冊，共包容九十八人的傳記，書中並非完全褒揚每位人物的善行，對於應該負起歷史教訓的責任的失敗人物，他也爲之立傳，說明他不僅是注意賢良的人物，並且藉一些失敗的人物，做爲吸取經驗教訓的借鏡。他也坦承表示：「『民國百人傳』是出自私人手筆，不是國史館官書，一切褒貶都只是表示相湘個人觀點。……近六十年來，人才原極稀少，能有一些成就，實在難能可貴。

並且世間無完人，每個人都有其長處和缺點。是非善惡是比較的、相對的。……在中國揚善隱惡的傳統下，除開大奸大惡以外，一般人稍有『缺德』，很少記載，自無從引據。」這是說明他撰寫這部書的立場，『民國百人傳』的第五冊也即將出版。

五 鼓勵國人重視歷史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於今年四月正式出齊，在三月刊登廣告時，立即獲得國內外學術界的熱烈反應。美國的一些教授收到此書時，便立刻寫信給吳先生，表示他們要寫書評，向美國的學術界介紹，並且希望美國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史的學者，千萬不要錯過了這部巨著。

吳相湘先生對於自己的成就並不自滿，他非常誠摯地說：「我主要研究的興趣，是在近代『通史』方面，因為我從前在北大時，就不斷受到胡適、蔣廷黻兩位老師的鼓勵，我的努力只在表示無負於師門。並且，我以通史的方式來寫，是希望一般人也能够有時間去看書，以取得他們所需要的歷史知識，尤其是對

中日、中俄的關係，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我寫的通史是概論性的，但每一細節都值得讓學生做一篇論文，我誠懇的希望國內各大學歷史系的學生能夠來做，我深深相信孔子說的『後生可畏』，也相信『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句話。在十年二十年後，我希望能看到年輕朋友在民國史方面的研究，已有許多可觀的成績。」他也坦率地指出：「民國史的研究是不應迴避的，胡適先生常說：『自由是包括學術言論自由，都需要由自己努力去爭取。』在民國史的研究上，我自己就是在這個原則下去努力，我不畏權勢，不怕壓力，為的是要保存歷史的真面目。」

吳先生的鼓勵是非常有意義的，他很熱切期望看到國內的現代史研究蔚成風氣。「亦雲回憶」這部民國以來的重要史料（即黨國元老黃膺白先生一生的記錄），也是在吳相湘先生的鼓勵之下，在臺灣出版發行的。他的目的是，現代人物傳記的出版，可以帶來面對現實的風氣，他自己不僅努力研究民國史，也鼓勵他人注意研究。

吳先生是民國四十一年秋天，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民國五十五年夏天，前往新加坡南洋大

學任歷史系主任。民國五十八年回到臺北，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在他的學術生涯中，曾經三次訪美，兩次訪英，五次訪日，一次訪韓越，兩次訪新加坡。每到一個地方，便充分利用時間，盡量閱讀各地所藏的檔案，他的許多論文和專著，都是他到處奔波所留下來的成績，他堅信「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這句話。他的學生中，也有不少人在學術界漸漸建立了地位，如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郝延平、龔忠武兩位先生，在近代史方面都已寫出不少有份量的著作了。

那天筆者向吳先生請教了許多問題，真有「勝讀十年書」之感。送吳先生回家時，臺北街頭下着濛濛細雨，看到他健壯的身影，和頭上的幾根白髮，我不禁想起胡適先生的詩句：

略有幾莖白髮，

心情已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吳先生的心情也許「已過中年」，然而，他「拼命向前」的精神，却是有目共睹的，對於這位民國史的見

證者，筆者是非常敬佩的。（六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完稿）

吳相湘著作（編）一覽表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台北市綜合月刊社
民國百人傳	傳記文學社
民國政治人物	傳記文學社
近代史事論叢三冊	傳記文學社
孫逸仙先生第一冊	傳記文學社
宋教仁	傳記文學社
愛國憂時文存	傳記文學社
晚清宮庭與人物二冊	傳記文學社
三生有幸①	三民書局
近代人和事	三民書局
民國人和事	三民書局
晚清宮庭實紀	正中書局
俄帝侵略中國史	正中書局
長城	正中書局

南京

俄寇侵華策畧剖析

近代史料舉隅

中國現代人物

紫禁城祕譚

抗戰紀實四冊

正中書局

華國出版社

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

同 右

遠東圖書公司

商務印書館

中國史學叢書 50種

民國史料叢刊

中國近代史論叢

中國現代史叢刊 1—4

中國現代史叢刊 5—6

中國現代史料叢書

學生書局

傳記文學社

正中書局

正中書局

文星書局

文星書局

預告

吳相湘教授，將於下（十六）期開始，在本刊主持「信義書房漫話」專欄，首三篇文章之題目分別為「家住書店街，走到書店街」，「專家前輩啓發『書目』興趣」；「海內外的圖書館」，特此向讀者敬告。